



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 交汇与个性 ——访 UCLA 亚裔美国文学专家凌津奇教授

吴道毅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访学期间,笔者有幸采访到该校英文系教授、亚裔美国研究系系主任凌津奇教授。凌教授主要从事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已在英美一流学术出版社出版 *Narrating Nationalisms: Ideology and Form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和 *Across Meridians: History and Figuration in Karen Tei Yamashita's Transnational Novels* 两部专著,并用中英文发表了众多学术论文,是目前跻身于美国该研究领域前沿、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主要代表人物。得益于国外严格的学术训练、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与钻研,他不但学术素养深厚,而且文学见解富于思辨性和开拓性,擅长将严密的西方理论逻辑融于自己的思考过程,他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进入他所在领域的学术方阵,受到学界高度认可,对国内文学研究不无重要启示意义。凌教授的学术成就、研究思路与治学方法等,也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对他做了一次学术访谈。



凌津奇教授

一、全球视域下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

吴道毅(以下简称吴):凌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接受我的访谈。您是为数不多在美国名校名系任教、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仅在 UCLA 人文学部的英文系担任正教授,而且还在该校社科学部的亚裔美国研究系担任系主任。这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您的学术成就令人钦佩,影响很大。能首先谈谈您在国内的家庭与求学背景吗?

凌津奇教授(以下简称凌):我其实并不像你说得那么好,不过是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力而为,比较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罢了。我来自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南方人,受过良好教育。父亲能用英文书写;母亲上过教会学校,会讲一点美式英语。我“文革”中下过乡。后来能够从事文学研究,得归功于一些前辈学者的指点,其中有唐宝心和黄祯寿教授,他们都是我在天津师大英语系攻读硕士学位时的恩师。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巫宁坤教授是我硕士答辩委员会主任,他对文学问题近乎苛刻的严谨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对我影响较大的是两位美国教授:Arnold Edelstein 和 George Deaux。Edelstein 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也是我的硕士导师。Deaux 是存在主义小说家,我在他们指导下先后受过三年的英文写作训练。

吴: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无疑离不开出国留学这一重要环节。您是怎么走上亚裔美国文学研究这条道路的呢?

凌:我1987年考取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美国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并拿到全额奖学金,用5年完成了学业。我留学的惟一目的是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没有留下工作的打算。后来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我也作了相应调整。我选择主攻亚裔美国文学多少是一种巧合。在学期间,我出于好奇心选修了Stephen Sumida教授开的一门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生课。Sumida是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奠基人。我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读到汤亭亭、布洛桑、赵健秀、冈田、雷庭招等亚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受到很大震撼。Sumida教授后来成为我的博士项目导师,对我的影响延续至今。

吴:原来如此。能介绍一下您的文学博士论文选题与写作情况吗?

凌:我撰写博士论文时,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在美国如日中天。学者迫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作一个既有批判棱角又有美学内涵的诠释。他们当时针对的是后现代文化批评将文学问题边缘化的旧历史主义倾向。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将文学主体的建构想象成一种能超越历史和现实羁绊的自我完善过程。这种想象不仅忽视文学与社会权势之间的等差关系,而且否认新生文学主体因为被剥夺文化资源而不得不借用西方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必要性。旧历史主义在后新批评文学话语中比较流行。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协商的游戏:论二战后的亚裔美国文学话语》,强调新生文学主体与“文化霸权”之间既抗争又妥协的纠结关系,采用了不少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这种纠结关系主要通过美学特征在文本中得到体现。因为我的博士论文能紧扣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再现中介性的探究,引起了一定关注。

吴:您的第一部专著《叙述民族主义:亚裔美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形式》199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已经成为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论著,也可以说构成了您学术地位的重要基石。我拜读了这部书的中译本,深感耳目一新,尤其感到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扩展视野、提升学术水平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能否请您解释一下书名的含义与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

凌:我书名中“民族主义”一词的英文本来是复数。译成中文后成了单数。我用复数“民族主义”作为主标题有两个目的。首先,暗示民族主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通过这种暗示质疑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一论点的普适性。其次,介入西方后殖民批评话语中盛行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片面观点,该种观点坚持民族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要与主宰性权势和意识形态同流合污。我书中提出的主要反证就是被认为代表“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第一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啊嘞!》(1974)。我认为,无论是语境还是实际效果,后殖民理论关于民族主义的假设与《啊嘞!》提倡的文化民族主义均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啊嘞!》运用欧裔美国民族主义的父权逻辑和同化论辞令提出亚裔美国人对主流社会的诉求,但这种诉求并不能消除亚裔遭受种族歧视的历史和物质状况。同时,这种做法又是颠覆性的:它通过自讽和反讽的方式将美国民主体制的内在矛盾公之于世。事实上,《啊嘞!》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这种结构性缺失体现了战后亚裔美国文学创作的希望和困境,说明了该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与政治过渡性。这本书第一次将美学形式问题摆上了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日程。

吴:您的第二部专著《越过子午线:山下凯伦跨国小说的历史与虚构》(以下简称《越过子午线》),201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国内朱小琳教授不久前就在《博览群书》撰文给予点评,谈到该书在对山下地缘政治想象所作分析时展现的敏锐捕捉力和理论洞察力。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专门研究日裔美国文学的专著呢?批评主旨是什么?

凌:山下是当代美国最前卫和最富于开拓性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影响远远超出亚裔美国文学的范围。《越过子午线》主要是通过空间唯物论和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剖析并评价山下在后现代叙事形式、魔幻现实主义、视觉和操演表现手法、另类离散模式和生态批评等方面对跨国文学所作的独特贡献。此书是美国系统研究山下小说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将亚洲人在南、北美洲——特别是巴西、墨西哥和洛杉矶——的离散经历上升为文学批评范式的第一部专著。

吴:能够介绍一下您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吗?

凌:我最近完成了两篇英文论文。一是《推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试图从理论和文本两个

方面说明推测小说这个新兴文类在亚裔美国文学中的发展状况,已收入英国 Routledge 出版社 2014 年的《亚洲与太平洋诸岛美国文学评论集》。二是《亚裔美国短篇小说与形式的相对性》,通过考察短篇小说的形式特征重新评估小说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间的暧昧关系,将被收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的《剑桥亚裔美国文学史》。我还应邀用中文在年初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关于文学叙事形式研究的必要性——兼论族裔文学和文化批评》,该文指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族裔文学研究的不足,并思考卢卡奇小说理论的贡献。我刚刚与英国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签订了正式合同,为其撰写《亚裔美国文学批评精华导读》,这是通过批评话语勾勒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现状的首部专著。我还有一本酝酿中的英文专著,题为《渴望的口音:亚裔美国散文虚构与形式的相对性,1937—1968》(*Accents of Yearning: Asian American Prose Fiction and the Contingencies of Form, 1937—1968*),主要考察亚裔美国作家在 1930 至 1960 年代如何通过成长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短篇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形式,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的种族、性别、放逐和世俗化等问题作出判断与回应。

二、中西文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

吴:能否请您结合自己学术实践,谈一下您是把什么作为切入点进行文学研究的?

凌:文学研究的切入点取决于许多因素与它们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组合方式,完全是机缘性的。这些因素包括学者受过的训练和影响、知识结构、知识面、对文学本质和作用的理解,也包括学者对文学理论的熟悉程度等。这些因素能够决定学者对一部文学作品中不同侧面的敏感度,决定他们为什么会压抑或延伸该作品的意义。文本进入学者认知领域的途径和效果完全因时代和学者期待视野的不同而迥异。就外国文学来说,欧美主流文学和西方族裔文学其实都值得研究。但研究结果不取决于究竟是研读莎士比亚还是研读汤亭亭,而是取决于学者使用什么方法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此外,现成的批评范式只适用于赋予那个批评范式具体形态的语境和学者解读作品的当时状态,不能原封不动地推而广之。我觉得,文学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同时切入:一方面,所选的课题为什么值得研究?这种研究在什么程度上是一种有新意的尝试?另一方面,应当提出什么样的文学问题和采取什么样的批评方法才能实现该学术创新项目的创新性?

吴:为什么要选择这些问题作为切入点呢?

凌:因为它们有助于学者思考自己的智性资源、文学背景和客观条件是否允许他们较好地完成所选课题,完成的课题是否对学界真正有所贡献。学者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可以不强调原创;但对学者本身来说,没有创意的文学研究项目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做。

吴:您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您非常扎实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背景,您同时又对这些批评理论注意扬长避短,博采众长。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与从跨文化角度运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

凌:文学理论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的抽象与深奥,而是因为它能就文学的本质提出一些从非理论角度提不出来的重要问题。在美国,只有极少数人从事理论的专门研究,因为理论创新非常困难。而对理论的把握程度,还要看使用者能否将理论恰到好处和富有创意地用于文本分析,用具体的文学研究程序来印证理论的潜力或偏颇。理论的理想境界是被内化为思维方式,但理论的内化离不开产生理论逻辑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也就是说,西方理论不光是书本知识,它也是社会存在、情感结构和政治信仰。至于西方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应用,我是这样认识的:第一,理论全球化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一部分。它的总趋势在后苏联时代是难以逆转的。第二,西方文学理论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用“先进”来形容会误导读者,也会引起盲目引进。第三,西方文学理论是多样化的,它对国内文学研究的适用程度取决于个体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对理论话语的掌控能力。但借用理论的一方必须能够高屋建瓴,学会识别和筛选理论,才能避免盲目跟风,使引进的理论真正学以致用。

吴:从古至今,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总体上较为偏向感性的或印象式的批评。像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就是这种批评的典型代表。这种批评方法自然有其可取的一面,如对作品的把握比较直观、感性、灵动,甚至富于一定的文学性。但也存在严重局限,如缺乏理论基点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您在研究中却能

完全做到用严谨的西方学术思路考虑文学问题,您是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学术研究的本质呢?

凌:这是个宏大的比较文化问题。我尝试着从以下角度谈一些看法。我首先想强调,西方学术思路的本质是多元化的,其中既有崇尚逻辑推理的文学诠释传统,也有相当成熟的文学赏析文化。就文学赏析文化而言,在大学英语系本科生的文学和创意写作课上能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书评专栏体现的也是这种文学趣味。你提到的国内文学研究的印象式批评传统,使我想起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文学研究状况。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正是西方文学批评开始自成体系、逐渐独立于文学创作实践的关键时期。而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文学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混杂化的:它借用了大量非西方和跨文化的视角和手法。众所周知,庞德的诗歌就吸取了日本与中国的文学元素。但西方学术多元化赖以存在的大环境却是中国没有的,那就是西方有非常发达的实证主义和直觉主义学术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严谨的学风和进行抽象思维的能力都反映了这些传统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你说的西方学术思路,指的大概就是这些。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西方实证主义和直觉主义两大传统既互相冲突又互为补充,并通过这种互动形成了西方独特的人文主义研究景观。比如,文学研究本来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智性投入,但反实证的逻辑推理却必须是高度理性化的。唯其如此,文学评论才不会流于直观、印象和肤浅。我认为,中国印象式的文学赏析研究传统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这种传统更强调艺术家与作品的融合,注重艺术家在抒发自我情感时的悟性和有机的联想。但这种感性的或印象式的批评又不同于西方的直觉主义,因为后者的内核是非理性主义。近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起因是艺术家对商业资本主义产生了异化感。正因为如此,从乔伊斯到阿多诺都强调艺术家与现实保持某种批判距离的必要性。这也是离散理念的批判力度所在。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分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吴: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往往成为启蒙与救亡的工具。这种状况也决定了文学批评与研究总是从现代性诉求等入手,以致成为了思想、政治或文化的言说,可以称之为泛文化批评。这种批评与研究模式导致了文学研究与哲学、史学研究趋同,好像失去了文学研究的固有特性。您的文学批评应该说已经超越了这一传统模式。那么,到底存不存在文学的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之分?

凌:我想谈两点。第一,将文学分成内在和外在研究,那是新批评的发明,但也是它走下坡路的前奏。后新批评的西方文学话语认为文学没有内在和外在之分,也不存在固有特性。但后新批评对新批评的文本崇拜有些矫枉过正,从而又为旧历史主义的复归打开了方便之门。在1980年代后的美国学界,已经没有人再使用“文学外在研究”的提法,因为福科、阿尔都塞和怀特等人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结关系。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在突破新批评为文本设定的界限之后,如何继续把握文学的修辞特征和美学效应,从而寻求一种在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协商。第二,国内文学研究中存在泛文化的倾向,原因可能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从未真正体验过西方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的人文主义危机与接踵而至、长达几十年的形式主义批评实践。而早期现代主义之所以能够挑战欧洲的实证主义传统,并使艺术创作成为一种对内在真实性的追求,是因为西方知识分子在面对人文危机时有一些另类选择。比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抽象理念只有在艺术家决心抵制现有语言和文化秩序的情况下,才能被转换成形式主义逻辑。文学形式主义是艺术家与社会决裂的一种象征性宣示,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比之下,国内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批评则反映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中,作家和学者对创作主体、文学本质、文学功用与解读目标的独特理解。但改善这种状况的途径与方式应当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发掘国内资源和利用外来模式。我认为,学者只有在立足于国情和扬长避短的前提下,才能在借鉴西方文学思路时有的放矢;只有保留自己的声音,才能得到认真倾听。补形式主义课的提法是一个非历史主义的命题。

吴: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欧美文学和文化的普世性毋庸置疑。但有学者更强调西方文学的特殊语境和不同社会功能。您是如何认识文学普世性与特殊性之间相互关系的?

凌:美国大学的文学训练不鼓励学生笼统地谈论文学问题,因为文学的局部状况与整体特点或走向之间未必有内在联系,强调的是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特殊性。文学的普世价值一般指那些在跨文化语境下能够被共享的文学常规或常识性的文本符码。我的理解是,文学研究不能只满足于从常识性的文

学现象中得出一般化的结论；文学研究的根本使命是如何透过文学表象去考察文本意义的具体生成，探究不同文本的表意在世界文学的框架内如何体现文学生产的多元性和复调性，是更艰苦和更具实质性的投入。因此有些西方批评家将读者能否把握每部作品中独一无二的形式与内容看成是文学研究的伦理。

三、国内文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与路径

吴：相对强大的西方文学批评话语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批评，好像处于某种“失语”状态。国内文学研究界为了解决“失语”问题，只好不断借鉴西方模式，却由此带来一个连锁问题。这便是由于文化内核的隔膜，在借鉴西方话语体系过程中经常陷入生吞活剥西方话语资源或简单摆弄西方批评术语的境地，严重的文化误读令人震惊，以致画虎不成反类狗。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凌：你说的“失语”状况可能涉及到对“现代化”含义的一些误解，那就是“现代”被当成了一种按照欧美标准重新塑造自我形象的非本土化和外在化过程。我觉得，衡量现代化的标尺主要还是看参与该过程的人是否在心灵深处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看对人的状况是否表现出了更大的关注。据我观察，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引进的一些西方理论——比如后殖民批评、后现代文化研究和心理分析等——都有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难以在批评实践中有效应用。究其原因，还是这些理论的原生语境与它们被移植的再生语境之间存在较大文化隔膜。其实，国内与西方在文学理论应用上的不同步是正常现象，它反映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智性问题的不同感受 and 不同投入。萨义德说过，外来理论在新语境的压力下会被省略或延伸，不仅失去本来面目而且还会派作他用。理论的跨地域传输遵循的是一种完全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文化悖论动力学。这是在借鉴西方话语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

吴：我很赞同您关于中国文学批评不能简单“融入”西方话语体系的说法。那么，到底如何理解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的自我学术创新问题呢？

凌：我举个例子。现在不少西方学者都在谈论跨国研究，但具体情况出入很大。一些研究实际上是用新概念包装旧题目。比如，将传统移民社区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等称为跨国研究。我认为，成熟的跨国研究首先不能回避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和关于如何超越民族主义的具体理论思考。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是付诸实践的去殖民化，后者是用话语建构的反殖民主义宣言。但文化民族主义往往被混淆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跨国状态也经常被理想化为一种自主性的政治空间。其实，西方有些理论话语可能是未经过充分讨论的局部知识，或者是过渡性的理论尝试。国内所说的与国际接轨有可能是和某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嗜好吻合，果真如此的话，与国际接轨就会变成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总之，与国际接轨不能笼统地设定为“追赶西方”，因为“追赶西方”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会转变成对西方的排斥。与国际接轨还有必要肃清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西方”理论资源可以截然分成纯技术和纯意识形态的两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很容易被抽象化和神秘化，成为回避思考现实问题的借口。你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失语状态恐怕与这些都有关系。

吴：从另一角度说，中国的学术创新离不开后续人才培养。您能介绍一下美国大学培养博士的经验吗？中国与美国在培养博士方面到底存在哪些差异或差距呢？

凌：中美的博士生制度其实没有太多可比性，因为它们在体制设计、运作过程和学生所受训练方面都很不一样。我认为，在文学领域，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国内博士生训练强度不够，文学课程太少，学生发表论文时间过早。美国的文学博士生最快也要五年才能拿到学位，其中要用两年甚至两年多的时间全负荷地上课。在美国，英文系的博士生在参加资格考试前至少能通过所选课程深入了解十几位不同领域学者的治学思路并受到他们的严格训练。在此过程中，学生不断接触前沿性的知识、目睹高起点的学术追求、认真参与辩论与反思，从而最大限度地培养自己的批评意识和形成对文学的总体把握。国内文学博士生大多在导师一人指导下学习与研究，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拿到学位，所学的文学课程一般不会超过三门，比美国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修课还少。这种在导师指导下单兵作战的训练方法难以满足博士生建立高端知识体系和养成批判性思维习惯的实际需要。相比之下，美国大学多样化和高密度

的正规课堂训练(包括大量写作训练)对博士生的成长非常有利。这在名师云集的美国顶尖大学如此,在实力雄厚的一般美国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很明显。

吴:您觉得产生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凌:我想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大学没能为培养高端学术人才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与人文环境。就拿批判性思维来说,它不单指学者应具有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也包括学术以外的东西,如诚信、公正、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等。与此相联系的是大学要营造鼓励学生挑战学术成规的氛围。但挑战学术成规也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它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基本平等的社会关系和学术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据我观察,美国文学博士的市场淘汰率高达70—80%。也就是说,只有博士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竞聘过程中胜出。这些由市场筛选出来的助理教授反过来又成为保证这类大学教师梯队精英本色的基础。就此而言,严格的副教授(即助理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和教授晋升制度(tenure promotion),挑战权威的常态与“不出版即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潜规则,都是美国学术体制保证其自身活力和水准的内在需要,也是其弘扬个人奋斗精神和奖励杰出个人成就的表征。支持这种学术生态的就是大家常说的学术共同体。但建立高水平的学术共同体同样不是单纯的管理技术问题,不能依靠设立基金和学术头衔的方法解决,因为那会造成人与人之间新的不平等。此外,美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只需要时间的保证:它不用申报立项,也不用争取很多经费。我认为,关键还是如何营造出一个充满竞争活力、平实且民主、有利于知识和人才推陈出新的学术生态。杨振宁赞赏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但也坦言,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知识界和学术传统,而这类文化的建立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吴:您刚才谈到大学人才培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学术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有没有具体例子?

凌:UCLA有个名气很大的应用语言学系,完全符合国内关于“优势”学科的定义。但这个系最近关门了,原因是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太小。大学的名系关门,这在美国不算新闻,因为学校在招聘教师和设立专业时已经考虑到了这类投入是否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而那些与社会需要发生明显脱节的学科,不论它学术地位如何,都要接受市场的再检验和再调整。这种体制上的灵活性和务实精神来自美国大学那种自下而上的办学理念。相反,中国高教管理走的基本上是一条从概念到政策的路线,而且由于历史原因,主要通过与传统西方大学体制架构“挂靠”的方式,将旧的学科建设、缺乏学术定位的知识分子岗位和过时的大学功能统统纳入现代化的运行轨道。但由此产生的形式变革大于内容更新的困境反过来又使高校在面临新的挑战时举棋不定,裹足不前。我想,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大学的科研与学科建设接受市场的挑选。教育不能产业化,但市场竞争是避免浪费教育资源、增加办学透明度和提高大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吴:国内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目前国内对学术量化要求的种种弊端。对此您怎么看?

凌:文学研究其实不是不要量,但量的考察必须顾及到文学知识的积淀过程和文学研究的生长周期。文学批评多少是一种“阳春白雪”的东西。目前国内对科研论著、项目在数量与等级方面的追求往往是以牺牲学术质量为代价的,这对青年教师的成长尤其不利。学术量化考核的社会后果更为严重,它使文学创作不再神圣,使人们对文学研究不再敬畏。由此又衍生出智性劳动贬值,学术研究走捷径与权威仲裁机制失据等问题。这是非常糟糕的。

吴:怎样才能走出国内在培养高端学术人才方面的这种窘境呢?

凌:在国内博士生的培养和训练方面,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已经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改革办法,可以考虑付诸实施。我认为,国内学界应多研究香港、台湾、日本和新加坡大学的经验,因为这些大学在人文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思路和做法容易借鉴。反之,英美大学英文系对母语水平有极高的期望值,对学术创新也有很苛刻的要求,其办学模式不见得适合国内的现实需要。我注意到,国内高教管理部门为解决培养高端学术人才问题经常采取的一个策略是大量向西方国家派访问学者,并将教师的访学经历与他们的职称晋升挂钩,大概是想借助西方的学术体制来提升国内教师的科研水平。但访学在美国大学里只是一种“礼仪性”的安排。它有助于教师开阔眼界,但并不涉及正规的学术训练和正式的学术交流,其结果可能与高教管理部门的初衷相去甚远。国内在培养学术人才时不能

总走捷径，而应当花大力气去完善那些限制人才培养的机制，尽快改变尚不符合国际规范的学术量化与行政化的做法，同时鼓励人文知识分子多关注国内文学的现状，多探索源于中国现实的文学想象与理论难点。只有增强文化自信，人们才能客观地应对西方话语的挑战和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的学术需要。

吴：可否请您从在 UCLA 担任系主任的角度谈谈国内同行可以借鉴的管理经验？

凌：我想与国内同行切磋一个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在美国大学，系仍然是最重要的学术单位，因为它承担所有教学任务，并通过招收新生和培养本科生、研究生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 UCLA，考察系主任(department chair)工作的是“学部主任”(divisional dean)。监督 dean 工作的是掌管所有学部和与学部平行的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s)的常务副校长。国内往往将中国大学的“院长”(college head)误认为美国大学的 divisional dean。这两个职位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内涵其实很不一样。比如，UCLA 文理学院有四个大的学部，每一位 Dean 都管辖十几个系和众多跨系的教学实体与研究中心。国内没有美式的“文理学院”(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s)。人们说的“学院”大都由系升级而来，是大学扩招政策的产物；国内大学“院长”的工作也没有超越美国大学系主任的职权范围。在此情况下，如果将国内的 college head 完全等同于美国的 divisional dean，就会给大学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前者在国内大学管理体制中基本得不到有效的学术与行政监督，故而在学科建设、科研立项、对外学术活动、经费分配、人才招聘和人才引进等重大问题上容易出现随意性和片面性，甚至官本位倾向。这不利于大学的总体发展。

吴：您似乎谈到了一个文化误读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呢？

凌：我注意到国内一些大学正在试行“学部”制，应当有比较成功的例子。“学部”的主要使命是沟通、监督和协调。美国大学的 divisional dean 一般出身于系主任；他们不仅熟悉系务，而且有志于在学部内部和学部之间开展跨学科合作与创新，并通过支持处于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系来协助校长实现大学的理念。国内在将系升级为院的过程中，不仅模糊了系与院之间的主次关系，而且使院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建制。我觉得，在校长办公室和升级后的系(即院)之间建立一种类似学部那样的督导与整合机制，似乎是目前国内大学管理中的当务之急。

吴：最后，您对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现状与今后发展方向有什么建议和展望？

凌：在我印象中，国内从事英美文学研究的学者好像比美国还多，但大部分研究成果却只是对国外已有论点进行的某种总结或转述，而这些二手文学研究也能在国内的核心刊物上发表。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这类用中文编纂的英文研究成果，它们的读者到底是谁？据我了解，国内文学专业的学生感兴趣的并不是断章取义的外来文学评论，而是如何读懂与欣赏英美文学的原著。就此来说，尽管上面谈到的外国文学研究既不符合原创精神，又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但它们的大量存在却构成了国内学术量化政策的运作基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建议尝试开展两项工作。第一，创办几个类似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Concentric* 那样面向国际的英文文学研究期刊，作为国内外语教师 and 海归文学博士的首要学术平台。因为国内目前清一色的用中文发表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做法已经严重地阻碍了该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它不仅导致外语专业的学者在外语运用能力方面的弱化，而且还使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无从与国外学术界在同一水平上交流、对话与竞争的实质上的“闭关锁国”状态。英文研究期刊能够直接与有效地促进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二，鼓励教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外国文学的教学与译介中去。在适当压缩外国文学研究规模的同时，提高文学译介的质量，因为译介能为国内读者提供必要的信息与学术导向，但参与的院校不宜过多。文学研究的目的毕竟还是在于发现与创新。

●作者地址：吴道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Email: dyw_6898@sina.com。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4]3012)

●责任编辑：何坤翁